



6

1985

近代史 研究

JIN DAI SHI YAN JIU



1979年10月创刊

1985年

近代史研究 6

(双 月 刊)

总第30期9月出版

李大钊1924年在苏联的讲话和文章..... (1)

附：关于李大钊在苏联讲话和文章的说明 (李玉贞)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产生的背景

及其基本发展情况..... 薄一波 (11)

* * *

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代表团

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 钱之光 (25)

华侨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黄慰慈 许肖生 (60)

中共江苏“二大”与李立三“左”倾

错误的形成和发展..... 陈鹤锦 王楠 (79)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概述及其评价..... 黄如桐 (94)

“非常会议”中的几个问题..... 闻少华 孙彩霞 (117)

* * *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格致学..... 胡思庸 (129)

马关议和前夜的清政府与列强..... 季平子 (153)

二次革命中的上海资本家阶级..... 丁日初 (168)

* * *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关系研究随感..... 王学庄 (193)

建国以来鸦片战争资料整理出版述略..... 刘德麟 (207)

关于张德彝《七述奇》手稿..... 赵金敏 (222)

对美国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和

中国革命问题的印象..... 向青 (233)

· 读 史 札 记 ·

- 包令论林则徐..... 刘存宽 (241)
关于币制实业借款第一次垫款交付日期的考订... 李丹阳 (243)
也谈邵飘萍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 耿云志 (246)
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
“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 邓 野 (253)

· 史 学 动 态 ·

- 第三次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谢 维 (258)

* * *

一九八四年国外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索引

-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263)
-

李大钊一九二四年 在苏联的讲话和文章

(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琴华^①同志 对《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 (1924年9月13日)^②

中国目前的内战^③是由国际帝国主义策划和支持的。英美资本家支持的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同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张作霖和段祺瑞集团正在华北和华中地区角逐。

英国资本正在孙中山革命政府辖内的南方帮助受直系军阀支持的反动将领陈炯明去反对孙中山。英国资本又组织了并正在支持以(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中国商人陈廉伯为首的所谓“纸老虎”的法西斯军队。

应当指出,南方孙中山的政策至今还不够明确。他本人尚未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前不久他甚至指望能在“纸老虎”的军队里得到支持,曾出席他们的阅兵式并给他们授了旗^④。最近发生的事件彻底暴露了外国资本的全部阴谋,而且必定会帮助孙中山本人在工农群众中找到踏实牢固的基础。

① 李大钊在苏联期间的化名。见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07页;另外,李大钊代表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也是以琴华的名字发表的,见《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卷第665页。

② 发表日期。

③ 指直奉战争。

④ 我们只知道1924年7月29日有过这样的一件事。见契列潘诺夫《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笔记》第144页。关于孙中山对“纸老虎”的态度,详见《中国现代史》第169—175页。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群众说明这次内战的原因和性质。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斗争的同时，将组织这些工农群众投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

（二）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 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24年9月22日）

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活动的舞台。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落入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一些中国农民失去了土地和生产工具，沦为流氓无产阶级，目前正处于危机状态。一部分农民到国内的工厂去做工，另一部分投军，现在当了军阀的工具，还有一部分流亡国外，因中国的工业很不发达。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正进行着军阀混战，但这并不仅仅是军阀之间的战争，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日本一直帮助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英美则帮助以吴佩孚为头子的直系。尽管中国现在有这两个和更多的军事集团在进行角逐，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在不断发展和扩大。

然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可能发展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正把革命知识分子、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

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革命领导者的作用。

你们，莫斯科的男女工人们，组织起“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吧！共产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奴隶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

在莫斯科，我们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正沿着这条道路

前进。

聚集起你们的力量去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吧！

(三) 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

(1924年10月)

中国民众多少年来，一直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沉重压迫下生活。英帝国主义在中国表现了最大的侵略性。太平天国起义后，英国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把关税制度作为他们进行最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工具。现在，这个制度犹如一根长年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绞索，把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置于完全破产的境地。农民失去了土地，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饱受失业之苦，与此同时，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不断涨价又使他们背上异常沉重的负担，难以糊口活命。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工人被迫离开祖国流亡到世界各地——到日本、欧洲和美国去，那里的资本家利用他们一盘散沙的状况和廉价劳动来破坏本国工人的组织。而那些还留在中国的被夺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业工人则走投无路，只好去参军或沦为盗寇，为军阀和土匪头子的狭隘利益卖命。嗜血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不断鼓动中国的军阀和匪盗，向军阀头子提供秘密借款，向中国运送武器和军用装备。

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已非昔日可比，无暇顾及中国，这就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巩固它在中国的势力。但美国不愿将巨大的中国市场拱手让给日本，于是就拼命与之争夺。美国知道，日本依靠的是安福系和奉系军阀，便开始支持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军阀，让曹吴出面反对日本的走狗。多亏美国的援助，吴佩孚才打败了安福系和奉系。后来美英帝国主义者又联合起来共同支持吴佩孚，帮他打击孙中山的革命力量。他们不仅向吴佩孚和倒戈反孙的将领们提供武器，而且还借

助陈廉伯开始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广州组织法西斯活动。

因此，目前中国的内战是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支持吴佩孚进行军事冒险的结果，也反映了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分子以在中国内战期间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财产为借口而联合起来，以便利利用他们造成的混乱局面，靠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麦克唐纳所谓的工党政府彻底撕下了伪装，公开赤裸裸地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政府，积极支持其法西斯代理人。由于帝国主义者玩弄的阴谋，中国的局势正在日益复杂化。因此，很难说中国的这场内战还要持续多久。

所有这些帝国主义的军队^①，当然都是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工人组成的。他们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去当兵，去为帝国主义走狗们争权夺利而卖命。城市的工人、乡下的农民被强征入伍，赶往前线。直系势力范围内的铁路工人受到了特别残酷的迫害。比如吴佩孚就是1923年2月7日血腥屠杀铁路工人的罪魁祸首。他唯恐再有反直系军阀的罢工运动爆发，就逮捕或解雇了所有与工会有关系的工人。工厂工人们的境况也不好。帝国主义的走狗带给他们的是死亡、恐怖、压迫、饥饿和强制服兵役。

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已经开始懂得谁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他们懂得，为了世界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要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

广州国民革命政府领导人孙中山认识到，在反帝反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策谋的法西斯运动的斗争中，必须依靠农民和工人。广东的部分工人已经武装起来了。革命政府吁请全体中国工人给以援助。这个呼吁是中国工人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发出

^① 原文如此——译者。

的第一声军事号令。

英国所谓的工党政府干涉广州的消息刚一传开，几十万苏联工人就在“不许干涉中国！”的口号下一致行动起来。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也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了这场运动。因此，工人群众已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向国际资本主义宣战了。中国工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同全中国工人一道应当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队。

（彭宏伟译、李玉贞校；原文载《远东问题》1985年第1期。）

附：关于李大钊在苏联 讲话和文章的说明

李 玉 贞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85年第1期公布了李大钊访苏期间的四篇文章。这些珍贵资料反映了李大钊1924年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为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进行的活动，从而充实和丰富了他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形象。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四篇文章的第一篇。它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用的是当年《真理报》加的标题《中国的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88—92页）已经收入。但是关于文章本身的情况应予说明。

这篇文章并不是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经查实，他并没有在会上做什么报告或发言^①。

不错，《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速记记录）第1卷第668—672页确实载有“琴华”的“报告”。但是，本次（7月1日第二十二次）会议执行主席盖什克在会上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中国同志琴华曾想做报告，但是今天他不能做报告。

他的报告将并入会议记录，也将在简报中登载。”②

显然，琴华的“报告”，不是7月1日口头宣读的，而是后来编入的。

认真分析琴华的报告，也可看出，它不象别的代表那样按会议安排，直接针对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进行讨论，各抒己见；他的报告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与会上讨论的殖民地问题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么琴华的“报告”是怎样一回事呢？

这是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据李星华回忆，还在大会开幕之前，中国代表团的报告就写好了。李大钊写出初稿后“与其他五位代表一块儿做了详细的研究、修改，然后由他亲自将报告送给了共产国际。”③ 7月11日《真理报》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标题是《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该报编辑加的说明是：“现刊载中国代表团的声明，将其补入7月1日讨论民族问题会议的记录之中。”

所以，载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的所谓琴华那个“报告”，实际上并不是在会上的发言，因而也根本谈不到琴华是否回答曼努伊尔斯基的“批评”问题④。

下面再说明其他三篇文章。

（一）关于《对〈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

在国际“五大”开会期间，李大钊深切感受到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者对中国人民的关怀和对孙中山的仰慕。他记述说，经常有人“询及孙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自然的流露出来。”⑤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由孙中山主盟于1922年8月就加入国民党的孙中山的战友和知交李大钊，看到这种情景自然是感到十分欣慰的。同时，他努力宣传孙中山奉行的三大政策。

国共合作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吓慌了革命的敌人。孙中山的许多政策，关于扣留关余，扣压英国秘运广州的军械等的做法，

触犯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于是英帝国主义麦克唐纳政府派遣九艘军舰开进白鹅潭，炮口直指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大本营。强盗们剑拔弩张，武装干涉一触即发。

然而，枪炮是吓不倒革命人民的，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正义事业得到世界人民的同情。于是一场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

9月5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工会代表在莫斯科劳动宫举行大会，洛佐夫斯基发表长篇讲话，声讨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企图。上述两个组织发起成立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并于9月6日发出《致各国工人书》，指出：“英、美、法、日资产阶级对孙中山的进攻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这些劫路的强盗未能把绞索套在苏联的脖子上，就把活动重点转向远东”^⑥，因此，各国工人应组织起自己的“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并给予中国人民以物质上的援助。此后，苏联和世界各地都相继成立了这样的组织。9月6日，《真理报》发表了该报记者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会成员罗特施泰因的谈话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法国共产党人特莱恩的谈话，同声谴责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径。

9月初，李大钊在列宁格勒参观时，就曾见到该市四十万工人给英国职工大会的电稿，号召英国工人反对麦克唐纳政府干涉广东革命政府^⑦。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大钊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采访。

他在谈话中，光明磊落地指出了孙中山政策中的不足之处，既有婉转中肯的批评，又有热情真诚的决心。

事过六十多年后再读大钊的谈话，人们会更深刻地领悟一个道理：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国革命之所以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正是因为国共两党的大多数同志都抱有这种彼此以诚相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态度。

(二)关于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前已述及，1924年9月，莫斯科笼罩在一片声援中国革命的

风云之中。示威游行几乎天天都有。9月18日，莫斯科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举行了有五百人参加的大会。其中有一名中共中央的同志，曾于当年6月在中国第二次会见过孙中山和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分参与国共合作的伍廷康在会上做了题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与中国内战》的报告。他向与会者介绍了他从中国带回的最新消息和孙中山政府的情况。9月22日“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假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集会。实际上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国际援华反帝大会。在主席团就座的有英法日苏等国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的杰克逊代表该组织及美国黑人和美国共产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拉狄克做了《中国为什么发生内战》的报告，英、法共产党都有代表发言。

李大钊从列宁格勒回莫斯科后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当他登上主席台时，会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会场安静下来以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充满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显然，会场的气氛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高昂热情，强烈感染了李大钊。两天之后，他从莫斯科给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社记者写信，介绍当时的情况说：“‘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到处组织此等团体，天天都有集会，报告中国的事，同声一致的赞助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前晚在大剧院又有数千人的集合，英国共产党领袖马克曼努斯及中国、法国、美国、日本的共产党代表均出席演讲”。最后，李大钊恳切地表示，希望“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⑧

（四）关于《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

这是李大钊为红色工会国际的机关刊物写的文章。写作时间

也在九、十月份。内容还是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广州政府。但是这篇文章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孙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李大钊在9月13日接受《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时曾说，孙中山一度对“纸老虎”商团军寄以希望，而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但到十月为《红色工会国际》撰文时，已肯定孙中山认识到“在反帝反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策谋的法西斯运动的斗争中，必须依靠农民和工人”。

第二，这种提法的权威性。李大钊对孙中山态度明显的转变给予肯定，一则说明他身在异乡，但时刻关注祖国的革命；二则说明他对孙中山这个对中国政局有影响的人物是如何关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法也反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孙中山的看法。伍廷康在1924年6月写的《中国南方的形势和孙中山政府》一文中曾说，孙中山政策的重点在反对陈炯明，因此他依靠借款更主要是依靠募款，所以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和牺牲民众利益^⑨。到这年8月，孙中山还对解除商团的反革命武装犹豫不决^⑩。但事态的迅速发展——英国总领事的威胁性照会，商团的罢市，广州水域英舰的出现，尤其是广东工农运动的崛起，这一切打开了孙中山的眼界。这样，孙中山便看清了“商团和英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阴谋。”^⑪

1924年9月伍廷康的小册子《中国当前的政局》初版时，作者已在书中肯定了这一点。

最后还要说明这三篇文章初次刊载的版本。

《对〈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初刊于《工人莫斯科报》(1924年6月13日)。

《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上的讲话》的内容，1924年9月24日《真理报》曾简要报道过，但未刊载全文。该协会于1924年出版的《不许干涉中国!》小册子收录了讲话全文。

《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初版于1924年9—10期合刊的

《红色工会国际》。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1965年苏联出版的《李大钊文章言论选集》和1959年我国出版的《李大钊选集》及1984年的《李大钊文集》，都没有收入这三篇文章。而在我国尚未见到初次登载大钊这些文章的报刊。苏《远东问题》在这些文章问世之后的六十余年再次予以刊载，我们才从“第二手”得到这些珍贵的材料，现将其译出，以飨读者。

注释

- ①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第49页；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07页；张静如、马模贞：《李大钊》第109页。
- ②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速记记录）第668页。
- ③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06页。
- ④ 向青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第49页说，曼努伊尔斯基批评了中国共产党。查共产国际五大速记记录第1卷第591、592、593页等涉及中国处，并未见“批评中国”的内容。
- ⑤ 《李大钊选集》第511—512页。
- ⑥ 《真理报》1924年9月6日。
- ⑦ 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1924年11月10日，引自《李大钊选集》第513页。
- ⑧ 同上书第515页。
- ⑨ 《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4年第7期第194页。
- ⑩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5—46页。
- ⑪ 同上书第46页。本文之所以强调伍廷康对孙中山的看法，一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正式代表，二是因为苏联史学界公认他的文章集中反映和代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观点。苏联的中共党史专家格卢宁在查阅了苏共和共产国际档案后说：“魏金斯基在1924——1926年间发表于《共产国际》杂志的观点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方针”（见《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年版第270页）。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产生的背景及其基本发展情况

(1960年12月23日)

薄 一 波

1937年抗战开始后，在山西有咱们三个战略部队，这就是：115师（晋察冀地区）、120师（晋西北地区）、129师（晋东南地区）。这三个战略部队到山西，对抗战起了很大作用，使山西整个形势起了大变化，对山西群众来说这是很幸运的。到处散播了革命种子，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后来是土改，组织抗日部队，后来是解放军，建立发展了党，对山西面貌的改变起了决定作用。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没有这三个战略部队到山西，情况不会这样好。过去山西人不愿意也不敢当兵，但后来不仅敢当兵，而且还组成了很能打仗的部队。对山西的新军和群众运动不要过分夸张了，不能与三个战略部队相比拟。

在抗战开始前，山西确有一个广泛的规模较大的抗日民主群众运动。性质是抗日民主。运动的形成是从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山西跟全国一样，遭到了异民族侵略的威胁，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以后经过上海1·28抗战，南方苏维埃、红军运动的影响。但这是一般的。在1937年前，山西仍在阎锡山军阀买办的统治下，这和全国也没有两样。最主要的是1935年日寇的继续进攻，使华北特殊化了。接着中、日签订“何梅协定”，又出现了汉奸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党势力被赶出华北，日寇就进一步向华北进攻和压迫，而国民党继续卖国，便爆发了12·9北平学生爱国运动，震动和影响了全国，也直接影响了山西。这个运动是在党的统一战线

政策影响下爆发的，也是党领导的。

1936年春红军东征，红军到了山西，这对山西影响震动特别大，群众都感到有出路了，要跟共产党走，跟红军走。我估计，红军东征除了军事上的胜利，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外，更深远的是党的主张和党的政策和山西群众见了面。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不仅在基本群众中散布了，也影响了山西的上层，不仅对资产阶级左翼有震动，甚至对右翼也有震动。1936年冬发生了百灵庙抗战，战争直接威胁到了山西，使山西人民以至山西地主资产阶级都受到极大震动，当时的形势给山西的统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出了个题目，政治上怎么办，走那条路？同时国民党向山西派特务，搞河东（汾河东）道独立运动，关麟征的五个师进驻晋南，也直接威胁阎锡山的统治。这样就有三种力量（共产党、国民党、日本）摆在山西资产阶级面前，我党有群众影响；国民党要挤掉阎锡山，阎锡山是多少年的山西的土皇帝了，对他威胁很大；另外日本要进攻。这种形势是9·18事变后特别是1936年后形成的，而1936年红军东征后更肯定了这种形势。这就给阎锡山出了题目，抗日呢，降日呢？拥蒋呢，反蒋呢？联共呢，反共呢？山西资产阶级不好解决问题，想独立也独立不了，三种力量都有威胁，三种力量都能整掉他，他要选一条道路，怎么做。毛主席在苏区代表大会报告里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状态。……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每个政党、阶级都要表明态度。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里说：“要站队”。阎锡山就处在这种形势。阎锡山实际上是由地主过渡到资产阶级的，但他是带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资产阶级。

返回来分析一下当时的阶级关系怎么样。山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阎锡山的统治下，处于初期觉悟的状态，有抗日的要求和反

阎的要求。在这点上必须讲到。阎锡山在1930年蒋、阎、冯大混战前，在山西群众中有一定的欺骗作用，认为他还可以。以前山西没有内战，没有土匪，经济上也相当“繁荣”。他也做了些资产阶级改革的事情，如植林、修铁路、建工业。群众还不认识他。但在混战后，对山西糟踏透了，山西票子贬值，不值钱了，群众不满了，乱了。他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因此，群众恨透了他，要起来反抗了。12·9、12·16学生运动和红军东征后（当时我还在监狱里）形势发展更快了，当时只要红军多待几天，群众就要跟红军走了。返回来说，山西统治阶级的内部也有分化。一是资产阶级右翼倾向蒋介石，他们在山西搞国民党，搞河东道独立运动，要归蒋介石，不归阎锡山了，搞阎锡山的鬼，阎锡山很害怕。这些代表人物，被蒋介石搜罗了一批，后来搞到重庆去了，如薛笃弼、范向篱就倾向蒋介石；再加孔祥熙也整他，徐永昌也在搞他，而最主要的是有一部分军阀，如王靖国、傅作义、孙楚等都被蒋介石收买了（这些人是在庐山受训时被蒋介石收买的）。另是左翼，这些人想跟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认为跟蒋介石没有出路，想借共产党的影响发展自己的势力，阎锡山也支持这条路线，想在跟共产党合作中找便宜。为实现这个问题，在红军东征不久，他召开了“自强救国同志会”（阎锡山的秘密组织）的“干部委员会”（相当中央委员会），共有发言资格的委员三十五人。阎锡山提出了“赞成或不赞成与共产党搞统一战线的问题”，要每人写出自己的意见。结果是赞成的有十九个委员，不赞成的有十六个委员，双方势均力敌，斗争得很厉害。这三十五个人后来为我们争取过来的有十来个，如张静萱、张绍发、戎子和等。这是资产阶级的左翼，它的代表是梁化之。右翼中有极端反对我们的，太原解放后为我们枪毙了几个，如薄佑丞、续继川等。其中还有一部分本质上是右的，跟阎锡山走，但不表态，如李冠阳、丘仰浚。而阎锡山本人实际上是右的，不过他比较聪明。日本来了，他非抗战不行，不抗战日本就要整掉他。要抗战，就非要跟共产党合作不行。他这个军

阎和别的军阀不同，他刮的地皮大都办了企业，后来我给他统计了一下，较大的企业有上百个。资金很难说有多少，总之，这包括了山西的主要财产在内，他的钱在外国不多，产业丢了阎锡山的钱也就完了。阎不能丢，但不丢又怎么办？在这个情况下，阎考虑了三种力量。阶级斗争是很紧张的，我回到山西时，他就公开和共产党合作了。他各方面都应付。当时，在太原已经有共产党的代表，这个代表就是周小舟，周当时以毛主席秘书的名义出现，阎经常接见。跟我的关系也算是公开与共产党合作的一部分。另外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同时还有日本的代表，并且很多。牛佩琮是我们的秘密党员，是阎锡山的秘书，他告诉我说：“阎的会客室里挂着很多象，接见那方面的就出那方面的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当时的群众还一下消灭不了他，他最怕蒋介石和日本，因此，他的政策是“自保”。他说：“存在就是一切”，这就是说能“存在”，当汉奸也干哩！“一切为了存在”。这时，他选了跟共产党合作这条路。他想借助共产党来壮大他的力量，招兵买马，因为他自己招不到了，非利用共产党不行。要共产党在群众中宣传他的好处，散布他的影响，给他筹款，给他抵抗日本和蒋介石。

他这个方针当时没有告诉我，这是我们后来摸清了的。我还在北京坐牢也快出来了，阎锡山就派梁化之、郭廷一于1936年秋带着不少钱来北京活动，与我接头了。我跟阎锡山是同乡，梁、郭也是我的同学。他们请我回山西。当时我请示了北方局刘少奇同志，北局说：“干”。当时党估计可以去，才叫我去的。所以我回山西是阎锡山按共产党请去的。我住在太原，与阎、梁等谈了些话，了解了一些情况，这是刚去的情况。当时山西也有地下党的组织。根据党的指示，我与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只做公开合法工作），我们按统一战线的方针，既要搞上属统战工作，又要发动群众，既搞抗日救亡，又搞民主。少奇指示要大手大脚的去工作。总的意思是：坚持党的原则和立场，在策略上要灵活。阎是饥不择食，与共产党